

寻找慈善传统

民国时期图书馆捐赠的社会影响(下)

李静 张久珍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捐赠活动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在文化传承、社会教育、制度建设和民族认同等多个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社会教育普及与新思想传播: 捐赠的公共性价值

民国图书馆是普及教育的重要场所。捐赠的图书、馆舍及资金使得图书馆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助力新思想的传播,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首先,实现了教育公平的推进与阅读权利的扩展。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捐赠极大地促进了知识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使读书看报从精英专属转向公共文化空间,推动社会教育的普及与阅读权利的扩展。卢靖因少年时亲历“滨江江湖,频苦水患”而致家中“稍有经史读本,水粹至,辄随波涛去”的困境,深切体会到寒门学子“虽有志向学,亦无书可读”的苦楚。这一经历促使他在发迹后大力捐建了包括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以及保定、沈阳等多地的公共图书馆,使无钱购书的学子获得免费阅读机会。同样,福建建瓯县公立图书馆在谢伯渊主持下,通过个人劝募获得捐资以购新书杂志,同时在征书启事中,广泛征集各种新旧图书以及学校讲义录,使小县城民众也能接触到最新知识。受益于邓塘秋捐基金两万元并因之命名的重庆青年会塘秋图书馆于1933年迁入新馆且聘请专人管理后,到馆阅览者日达百余人,阅览报纸者每日六七百人,短短六个月总计到馆人数已达十五万七千余人,充分显示了捐建图书馆在保障市民阅读权利中的重要意义。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

教育事业损失惨重,以“贖启民智、惠及教育”为已任的中国流通图书馆于1938年成立,发起人屠诗聘不仅自捐大量图书和中西文杂志,还聘请了福保、丁君旬、何清儒、高杰、陆步州等文化名人组成董事会,基于自购兼社会捐赠(寄存)的有限馆藏,通过到馆借阅、通信借阅、馆际互借以及多途径阅读指导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便利服务。同时,针对那些“家境清寒、品学兼优,无力缴纳阅读费者,经调查属实,得免费阅览以一年为限”,此举对于帮助贫困者获取知识大有裨益,间接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而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图书馆协会不仅将征集获得的图书统筹分配到边区的各图书馆、资料室、民教馆等,还送书到乡村,便利广大群众提升文化知识,了解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以及边区的民主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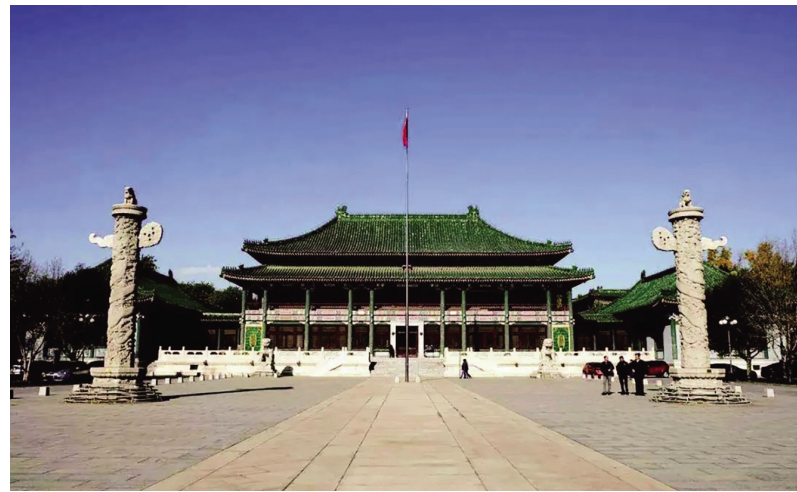
再者,起到了进步思想传播和革命信仰启蒙的作用。捐赠图书不仅发挥了普及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的作用,一些图书馆的特有捐赠还起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第二战场,如1947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图书馆即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室通过给图书封面加伪装的方式,将受赠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大量国统区难得的革命书刊提供给广大读者,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团结、引导青年学生,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斗争”。得益于这批革命书籍的熏陶以及平民图书馆组织的各类活动,一批献身于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成长起来,“很多参加过平民图书馆工作和曾到过平民图书馆阅读室的同志,在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都把自己信仰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机,归结为平民图书馆的影响”。

民族认同与文化救亡: 捐赠的象征性意义

在民族危亡之际,图书馆捐赠更被赋予文化抗争与精神延续的深层意义。捐赠超越单纯的文献转移,成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

战时文献保护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捐赠还被赋予文化拯救的历史使命。1938年5月,时任暨南大学(上海)教授的郑振铎因一时难筹1000元大洋购买32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明代赵琦美抄校本元明戏曲,共64册,含242种杂剧,其中135种为孤本,研究价值巨大),遂发动师生筹款。后该书被拥有另32册的古董商买走,凑足全本后索价1万大洋。郑振铎无奈请重庆教育部拨款,因汇款耗时,他先向暨南大学借款买下全本,使该书幸免散佚(《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1940年,为挽救江南文献遭劫的厄运,由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鏞、何炳松、张凤举五人秘密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止,该会累计收购了约10万册古籍,其中善本古籍约4.8万册,包括宋元刊本300余种及历代孤本。尽管文献保存会主要是利用政府款项在上海收购和保存古籍,但在此过程中,该会成员为抢救文献不惧深险险境,用满腔爱国心与精湛的专业技能(郑振铎负责采购、张元济鉴定宋元善本,其余同志负责资金管理)与版本审定)消除了时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忧虑。他们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社会资本(人脉)和文化资本(学识),这更不失为一种崇高的无形资产的捐赠。

华侨捐赠中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情怀。海外华侨向图书馆的捐赠则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与特定项目的保护与开发。因此要加大大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传中华文化中“修乡邦情怀。以捐资兴学、支援抗战而闻名的南洋华侨陈嘉齐治平“仁者爱人”“以义为利”等传统美德,鼓励和支度先生为“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于1925年函厦大校持企业、社会名流、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基于慈善宗旨,自长林文庆、集美校长叶渊,愿捐二十万在厦建图书馆,又三十万在福州建图书馆。1927年,为筹建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伍智梅和黄谦益赴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等地华侨中筹款,历时近两年筹得美金10余万元(合广东大洋30多万元),认捐者达15000人。1933年,广东省馆并入市馆后修建文德路北馆主楼的款项也主要来自美洲华侨捐款。上述跨国界的个人或群体捐赠行为,彰显了华侨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祖国发展的鼎力支持。

普通民众捐赠的民族复兴愿景。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为谋充充实图书,复旦师生发起献书周活动,以师生捐赠为主,自重庆菜园坝总教总达三千余册。各教授于捐书外,凡市上不易购得之图书复愿将其私藏借存该馆陈列参考室中,供诸阅读,其嘉惠学子,良非浅鲜。”重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这场募书运动,所折射的正是身处艰难困苦

中的复旦师生合作建校的团结精神。这种以知识保存与分享促进民族复兴的理念,成为民国图书馆捐赠的精神内核。

对当代的启示

民国时期图书馆捐赠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通过文化传承、社会教育、制度创新和民族救亡四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历史实践的多重价值:在文化层面,它实现了珍稀文献从私藏到公藏的转化,构建了知识资源的公共性;在社会层面,它推动了教育公平与服务创新,使图书馆成为民主启蒙的重要空间;在制度层面,它促进了图书馆管理制度与行业规范的日臻完善;在精神层面,它承载了文化救亡的民族气节与知识报国的理想情怀。先贤们汇聚民间力量守护文脉和启迪民智的民国实践,在当下迈向更高质量、实现更高层次公共文化服务的进程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捐赠可弥补资源配置的缺口,需充分激发社会参与的主动性。

社会捐赠的灵活性与针对性能有效为资源薄弱地区“输血”,直接支持基层最迫切的文化需求,如为乡村学校捐赠图书、捐建图书室

或资助红色文化遗址、非遗工坊等特定项目的保护与开发。因此要加大大宣传中华文化中“修齐治平”“仁者爱人”“以义为利”等传统美德,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名流、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基于慈善宗旨,自发、主动地参与文化公益事业。

其次,捐赠能激发创新与传承的活力,要深化捐赠的社会价值内涵。

社会力量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物质,还有创新的理念与模式,有助于盘活文化资源。如企业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往往能催生更贴近市场需求的文化创新;而且社会捐赠资金还可以支持那些更具实验性、探索性的文化艺术项目,为文化创作提供更广阔的试验田,这与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政策导向一致。因此当代捐赠不能仅局限于物质扶贫帮困、助残济疾,还要注重慈善捐赠的长期社会效益,比如聚焦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部署,在助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高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上多作贡献。

第三,捐赠能凝聚共建共享的社会共识,要以制度护航社会公信力。

慈善捐赠是构建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它倡导先富人群通过投身公益带动后富人群,这与共同富裕的国家目标紧密相连。同时,当个人或企业为一座图书馆、美术馆、一场乡村艺术节捐款时,他们与文化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种参与感能塑造并强化全民守护文脉、传承文化的责任感,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因此一定要对慈善捐赠的款项和物质进行严格规范的使用和监管,构建透明信任机制,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从而获取公众信任,保障慈善捐赠事业健康且可持续发展。

(转自《图书馆》杂志)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贡献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坚持系统性治理、制度化保障,履行大国责任,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向世界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立足本地,影响全球”,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于今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设定的主题。多国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从本国国情出发,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持续推动绿色转型,同世界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为绿色国际合作和全球环境治理注入新动力。

制度筑基:系统推进生态治理

“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深刻阐述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与实践。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5月初,人们看到一百多只藏羚羊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的辖区内冒着风雪前行。经过多年对藏羚羊及其栖息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目前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到7万多只,成为青藏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联合国粮农组织去年年底

发布的《202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显示,2015年至2025年,中国森林面积年均净增168.6万公顷,居全球首位。

从大熊猫国家公园,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再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随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各个地区的旗舰物种野生种群数量持续恢复,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顾问委员吕植说,多年来,中国循序渐进布局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光土地和森林得到保护,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理念的普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和地质公园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托夫·范登伯格也认为,中国把国家公园建设同社区发展结合起来,“不仅增强了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也带来了更多收入”。

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构筑起坚实的制度保障。吉尔吉斯斯坦生态学家巴克斯别克·赛普巴耶夫说,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旗舰物种、关键物种保护为重点,加强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体现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前瞻性。

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副教授、环境人文学术项目负责人丹尼尔·布龙巴告诉记者,中国的生态环境法典以更综合、系统的方式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和气候

变化,为国际对话与互鉴提供新的可能。

绿色发展:生态与民生协同共进

5月初,来自荷兰、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科技工作者及学生代表来到四川汶川,了解这里的绿色转型情况。在曾经遭受大地震破坏的汶川水磨镇,63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实现整体外迁,全镇八级以上居民从事旅游相关工作。该镇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

在汶川访问的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阿诺德·塔克说,中国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做法,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样本,值得借鉴。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农村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鲁维亚·韦格纳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高度契合,“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模式,并且将这两方面均看作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环境问题研究员恩德兰图·拉扎卡马纳里认为,中国持续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考,其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性思维为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启迪。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形成重要共识,那就是环境保护、经济增

长、社会繁荣以及人类福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必须协同发展、相辅相成。”意大利国家生物多样性未来中心首席法务总监让·保罗·德里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全球担当:携手凝聚共治合力

素有“千丘之国”之称的卢旺达拥有从低海拔稀树草原到高海拔山地森林的多样化生态系统。然而,系统性收集该国植物名录的《卢旺达植物志》编撰于20世纪80年代,信息更新已显著滞后,制约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2023年起,中国科学院-非联合科学家的科研团队联合当地科学家,初步建立起对当地植物状况的综合分析框架,为卢旺达制定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展开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奠定科学基础。

在东北虎、远东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生存的亚洲东北部,中国与俄罗斯联合开展跨境保护工作,老虎“跨境游”的情况越来越多;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建全球葱园,用于保育和研究全球的葱属植物种质资源;在东南亚,中国分别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开展合作项目,推动红树林保护;中非共建的肯尼亚内马铁路采用特大桥全程穿越内罗毕国家公园方案,最低桥墩超过6米,让长颈鹿也能“昂首通过”……环顾全球,中国通过双多边合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践行共建美好家园的中国之诺。

作为首批签署、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主办

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昆蒙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态司副司长多琳·罗宾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推动通过的“昆蒙框架”是全球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2030年相关目标提供了清晰路线图,同时中国也助力非洲、亚太、中亚、东欧等地区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覆盖生态修复、资金动员、技术合作等关键领域。

乌兹别克斯坦咸海国际创新中心主任巴克特然·哈比布拉耶夫认为,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积极推动绿色国际合作,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展现了大国担当。

(转自新华网)

链接>>>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新增3380个动物界物种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供全球用户自由下载使用。

2026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和477个种下单元;植物界新增431个物种,减少2个种下单元;真菌界新增3114个物种,减少1246个种下单元。

2026版名录首次收录轮虫动物门(双巢纲、单巢纲)476种和节肢动物门弹尾纲734种;在昆虫纲下,新增蚤目10个科、膜翅目姬小蜂科、半翅目叶蝉科和鞘翅目拟步甲科等类群总计超过2000种;在脊索动物门方面,两栖纲新增48种,总数达到767种,爬行纲新增40种,总数达到731种;真菌方面,进行分类系统调整与更新,进一步扩大收录范围,新增超过1800个种及种下单元。

2026版名录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项目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生物资源计划和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中心的支撑。

中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名录总下载量超过24TB,在线物种页面访问量超过2700万次,被国内外期刊论文、专著引用超过1500次。

(转自新华社)